

# 文明互鉴视域下清代汀州朱氏对日医学传播研究

苏 华<sup>1,2</sup>

(1. 集美大学 外国语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21; 2. 集美大学 陈嘉庚研究院, 福建 厦门 361021)

**[摘要]** 日本所谓近世时期的东亚文化交流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之一, 也被视为东亚海域文明交流互鉴的一大样板。清代福建内陆地区汀州朱氏兄弟朱来章、朱子章、朱佩章, 通过对日输出医学书籍、推行医学实践、推动医道互动, 成为传播中华医学和优秀传统文化的载体, 在中日医学交流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对中日文化交流做出积极贡献, 带给我们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启示。

**[关键词]** 朱来章; 朱子章; 朱佩章; 医书输出; 医学实践; 医道对话

**[中图分类号]** G 1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889X (2023) 04-0040-08

## 一、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 “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 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sup>[1]</sup> 中国提倡坚持对话协商、共建共享、合作共赢、交流互鉴, 与世界人民一道共同推动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开放包容、共同繁荣的美好世界。

日本所谓的近世时期(1603—1867), 亦称江户时代, 这一时期的中日文化交流被视为东亚海域文明互鉴的一大样板, 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之一。对这方面的研究, 中国学者的成果主要有: 潘吉星从科技交流史的角度, 就清代中国医学渡日问题展开研究<sup>[2]</sup>; 唐权、刘建辉、王子沁从文化交流史的角度, 借助日本的第一手资料就所谓“来舶清人”的信息进行了整理<sup>[3]</sup>; 郭秀梅、葛文清等就18世纪中国的儒学者、医学者的赴日活动进行研究, 并提到闽籍汀州朱氏兄弟朱佩章(1662—?)、朱子章(1673—1726)、朱来章(1679—1745?)的事迹<sup>[4-5]</sup>, 等等。日本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有: 木宫泰彦以时间为线, 从中日文化交流史的角度肯定了朱氏兄弟的杰出医道<sup>[6]</sup>; 大庭修无论是从

中国典籍流播还是人物交流的视域, 皆提到中日之间的医学交流, 尤其是朱氏兄弟的在日活动<sup>[7-8]</sup>; 松浦章从东亚海域交流史、贸易史的角度对清代中国商人的海外贸易状况展开了考察<sup>[9]</sup>。而作为专门研究, 真柳诚从古医籍数据的比较, 对日、韩、越医学与中国医书的关系进行了全面探讨<sup>[10]</sup>。概言之, 围绕近世日本这一时期的中日交流的问题, 学术界展示出历史性、跨领域、专门化的研究态势。

本研究以文明互鉴为视角, 对汀州朱氏在近世日本医学传播展开探讨: (1) 鉴于迄今为止的中日文化交流人物的研究大多集中在郑成功(1624—1662)、朱舜水(1600—1682)、隐元隆崎(1592—1673)等一批代表性的人物, 而忽略了大多数作为草根存在的地方人士; (2) 鉴于大多数研究或是关注儒学对话、佛教传播、妈祖信仰, 或是注重于商贸往来、唐物楷船, 忽略了地方性的研究视角。本研究拟以来自福建的内陆地区——汀州朱氏兄弟涉及儒学教化、医学实践的在日活动为研究对象, 基于文明互鉴的视域对其重新加以审视, 通过挖掘中外文献史料, 结合已有研究成果, 探寻朱氏兄弟对日输出医学书籍、推行医学实践、推动医道互动的事迹及其影响, 以探究中日医学交流的重要意义和启示。

**[收稿日期]** 2023-01-02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1&ZD051); 集美大学陈嘉庚研究院重大项目(JGYJ202012)

**[作者简介]** 苏华(1969—), 女, 福建莆田人, 讲师, 硕士, 主要从事比较文化研究。

## 二、汀州朱氏的对日医书输出

围绕中国文化东传的研究，不管是严绍璦还是王勇，皆关注到中国书籍在日本的传播问题。王勇指出：“早期中国文化东传，大抵经由朝鲜半岛再流入日本列岛，书籍的传播也不例外。……至7世纪初观勒献书为止，汉籍经由百济流播日本的历史宣告结束，以日本政府派出遣隋使为契机，中日间直通的‘书籍之路’成功通航。”<sup>[11]</sup>中国与日本自遣隋使时代（600—614）开始就铺设起“书籍之路”，形成了日本接受中国文化的潮流。不过，严绍璦就中国文献典籍东传进行稽考之后指出：“前辈诸先生仅是著录了眼见的存在于日本的汉籍，未能把汉籍流布于日本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加以科学的考察，始终未能揭示以汉籍流布作为中间媒体而存在于中日文化关系之中的许多复杂现象及其本质。”<sup>[12]</sup>换言之，汉籍在日本的流布不只是一个书籍往来的问题，更是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一大现象，需要站在整体性、全方位的立场进行调查、追踪、评价。

就本研究所涉及的医学书籍传播而言，也淹没在错综复杂的历史脉络、宏博浩渺的汉籍文典之中。追溯中国医学书籍在日本的传播轨迹，依据甄志亚的研究，以《肘后百一方》为开端，《针经》《名堂图》《四海类聚方》《诸病源候论》等不少医书随着汉末以来的中原板荡、民族播迁而传播到日本。到了日本的平安时代（794—1192），大量汉籍得以传入日本，载录于藤原佐世奉敕编纂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就有大约166部1309卷医学书籍。这一时期，日本名医丹波康赖荟萃了204种中国医学典籍，撰成日本现存最早的医书、宫廷医学秘典《医心方》。到了江户时代（1603—1867），日本汉学者、长崎书物改役向井富编撰了《商船载来医家书目》，收录自日本元禄至享和年间（1688—1804）中国向日本输出的228种中医书，包括幕府将军德川吉宗多次借阅的《痘症世医心方》《医道》《万病回春》，乃至在中国尚未正式刊刻的《幼科折衷》写本。这批中国医学书籍或是日本幕府、町人自书商直接购买，或是通过赴日华人随船携带到

长崎。籍此，中日之间的医学书籍之路得以不断扩展。

作为将中国医书输出到日本的代表性人物，有唐代高僧鉴真、明末清初渡日僧侣隐元隆崎等一批佛教人士。依照大庭修在《江户时代日中秘话》的研究，则不能不提到来自福建汀州的朱氏兄弟朱子章、朱来章，书中记载：

朱来章，福建汀州府医师。入港后与仆人沈士义、德荣、阿庆三人宿于彭城藤治右卫门之宅邸，在此为期冀获得治疗的一般庶民悬壶行医。此后于享保八年十二月二十日进入唐人屋敷，次日乘寅二十六号郑大典宁波船归国。吴戴南曾于享保四年来航，入港不久即病卒，基本未能行医。因此，尽管朱来章不是首位来航医师，但是其在长崎的医疗活动事实上却属于首次，为此亦可能获得极高的评价。为了表彰其功绩，朱氏家人朱允光破例领到临时宁波船信牌。朱允光于同年七月二十一日乘二十四号周元吉船归国<sup>[8][136]</sup>。

在此，大庭修提到吴戴南于享保四年（1719）抵达长崎，但是未能继续医学事业，而后朱来章成为首位在长崎悬壶济世、治病救人的中国医者，故而应该将之加以大力宣扬。最为关键的是，朱氏外甥朱允光由此而蒙受恩遇，获得船信牌，可以从事自由贸易。由此佐证了朱氏一族在日本得以扎根下来的事实。

历史上，朱来章在1721—1726年期间3次赴日；朱子章于1725年赴日，翌年病死长崎；朱佩章于1725年赴日，于1726年返回中国。依照《通航一览》的记载和大庭修的介绍，朱氏兄弟，尤其是朱来章、朱子章的籍贯、履历、来日过程、医学实践和医学交流得以呈现，比较完整地描述了这一时期中国医者在日本的活动。与此同时，朱子章医师的事迹、与日本医者之间相互切磋的史实也都以“朱子章问答”的方式，被《通航一览》所记载，具体内容为享保十年至享保十一年（1725—1726）之间幕府典药头今大路亲显、幕府御用医师栗本瑞见与朱子章之间的医学问答，左为汉文，右为和解<sup>[13]</sup>。而朱来章的诊治医案，则以《南京朱来章治验》为题成书，在中日医学交流史上留下了宝贵的史料<sup>[14]</sup>。

朱氏兄弟除了著述成书之外，还携带了许多

中国医学典籍到长崎。依照大庭修《江户时代日中秘话》记载，朱来章曾向浙江总督李卫自供其在赴日期间将随船携带的500多本书籍售卖给日本当地人士。以1725年朱来章第二次赴日为例，大庭修在书中这样记述：“除献与将军《乐书》1部6套、诗牌1箱、长江图1幅、珊瑚枝1箱、银鼠皮驾龙坐垫2只外，还载来76种书籍用于出售，其书目见于《舶载书目》第15册。”<sup>[8][137]</sup>这一批被用于出售的医学书籍，既包括《医宗必读》《广群芳谱》《景岳全书》《医统正脉》《丹溪心法》《集验良方》《医书写本》《张氏医通》《医方捷径》《银海精微》等一批医书，也包括《本草纲目》《增补本草备要》《证类本草》《药性赋》《药性解》等本草药方书，皆是这一时期日本最为需要的医学书。

这一时期中国医学书籍的外传，绝不是简单的一条“书籍之路”。正如严绍璦所指出的，应该将之视为一个文化传播的途径。中国文化也随着医书而传播到海外，或者说医书成为中国文化海外传播的一大媒介。就在医学著作传播到日本的时候，中国以朱子学为核心的儒学思想、以黄檗宗为代表的佛教思想也传播开来，并极大地影响了日本学术界。事实上，这一时期中国医书不仅传播到日本，同时也传播到朝鲜。《朝鲜时代书目丛刊》记载了《本草衍义》《丹溪纂要》《医学正传》《医学入门》等不少中国医学书籍<sup>[15]</sup>。依照张伯伟的研究，明清更替“令使行记录一改‘朝天’而为‘燕行’，他们到中国最愿意做的事情，一是‘访禁书’，二是‘秀服装’。《肃宗实录》里说：‘凡官文书外，虽下贱无书清国年号者。’都是用崇祯多少年来表示，既是对明朝的追念，也是表示自身保存了中华文明”<sup>[16]</sup>。不言而喻，这样的医书传播成为中国儒学在朝鲜半岛和日本传播的一大媒介。

之所以在此突出中国医书在日本的传播，实则是为这一时期中国医学，日本称之为“汉方医学”提供合理性的存在证明。杉本勋曾在《日本科学史》一书中指出，兰学作为实用之学的实学，又是作为实证之学的实学，是日本近代科学的开端，且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sup>[17][248]</sup>。回溯兰学在日本的缘起，则不能不提到杉田玄白1774年译自德国医师J. Kulmus著述的荷兰语本

*Anatomische Tabellen*一书，该书被翻译为《解体新书》，一经问世便迅速传播开来，进而开启了一场名为“兰学”的西学运动。换言之，与中医相对抗、接受西方医学，这一事象成为日本近代走向科学、走向世界的“契机”。这样一来，中医最终被贴上了所谓“缺乏科学依据、难以获取实证”的标签。但是，审视17—19世纪的东亚海域交流，应该说不少兰学著作、医学书籍亦来自中国，或者是出自中国人的译介，即便是《解体新书》“凡例”之中，亦留下了这么一段说明：“斯书所直译文字，皆取汉人所译西洋诸国地名，而合诸和兰万国地图相参勘，集以释之，旁书倭训以便读者也。”<sup>[18]</sup>可以说，在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化向海外、向东亚的传播过程中，医学著作不仅成为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也是积极参与的一环。

### 三、汀州朱氏在日的医学实践

朱氏兄弟的渡日事件散见于大庭修、松浦章的研究之中，也在中国历史的记载之中留下佐证，展现出中日医学实践交流不可磨灭的一页。《宫中档雍正朝奏折》记载，浙江总督李卫曾向朱氏兄弟之一的朱来章进行质问，写道：

……供吐实情云。东洋唯日本为大，与普陀洋面相对，所辖六十六岛，不在一处。其与江浙贸易，马头名曰长崎，离国王将军驻扎之山城，自称京师，程途尚有二十余日。长崎设头目二员，称号皆有王家字样。非系国王。一管货物交易，每年更换，一管地方事务，常川住守。皆专生杀之权。此处夷人筑墙立栅，名为土库，凡中国商人到彼，俱住其中，拨兵看守，不许私自出入。彼向日无聊，因往东洋行医，曾治痊长崎头目王家，得有厚赠，故不与商人一同拘管库内，遂酬以倭照，贸易数年，家渐丰盈<sup>[19]</sup>。

该文献提到了日本的长崎、京师（京都）的地理位置，长崎设立管理货物交易与管理地方事务的专员，以及中国商人居住“土库”专属地等信息，最为关键的是提到朱氏兄弟到东洋——日本行医，曾治痊长崎头目王家而获得厚赠，进而获得从事往来贸易的权利的史实。正是以此为契机，朱氏兄弟得以在长崎开展行医活



动，展开丰富的医学实践。

1. 朱氏兄弟在长崎的医学实践体现在以《南京朱来章治验》为代表的医案交流之中。所谓《南京朱来章治验》，乃是由朱来章撰述记载的一册写本，旧医学馆藏，现藏于国立公文书馆内阁文库，函号：195-334。整部《南京朱来章治验》，详细记录了朱来章为平冈平左卫门之女、内田清助之妻等累计14位患者治病的医案，包括针对周身发冷、久嗽痰喘等病症的治疗策略、药方、效果。医案中，幕府“奥医师”即御用医师栗本瑞见就该医案写出评语，再由朱来章进行概述、评价。以下是《南京朱来章治验》的相关记载：

平冈平左卫门女，遍身作冷，诊其脉迟。经曰：血虚则发热，气虚则恶寒，以此知其阴阳不和也。初以十神汤治之有效，次以补中益气汤而愈。

愚按身冷脉迟是阳气不足之证也。故内经云：气血虚则恶寒。脉经曰：迟者，阳不胜阴，气血寒也。如何始不用补中益气加桂枝、芍药等之剂而与十神汤者，何谓也？十神汤治风邪兼寒之症而非治于阴阳不和之药也。病愈即愈，恐非适中。请释吾疑可乎。

余因脉迟谓有寒邪内闭，以致遍身作冷，故初剂以十神汤散其寒邪，次用补中益气汤以益气升阳而愈。先贤有云：人不受邪则无病，寒邪未解，焉敢遽进补药乎？虽补中汤补中有散，加入桂枝、芍药似亦可用，窃犹以为早也<sup>[14]</sup>。

朱来章的医案，首先记录患者姓名、症状、脉象，还记录了根据《黄帝内经》所做出的全身发冷是因阴阳不和所致的医学判断，并就药方和疗效进行了阐述。对此，栗本瑞见认为，全身发冷的根源在于阳气不足，亦利用《黄帝内经》《脉经》的描述提出质疑。朱来章反驳栗本瑞见，指出脉迟就代表寒邪内闭，故而一开始需要使用十神汤祛除寒邪，再以补中益气汤益气升阳，从而以先人说过的“人不受邪则无病”，为自己因“寒邪未解”，不能急着给病人下补药提供理论依据。最后，朱来章指出，补中汤补中有散，亦加入桂枝、芍药，但为时甚早，须待时机。

2. 朱氏兄弟的医学实践活动体现在医学问

答之中。《通航一览》记载：

恭呈大医官栗老先生大人台下……承问难经五十三曰七传者死间藏者生云云，愚谓七传者，传其所胜贼邪也。间藏者，传其所生虚邪也。如心病为一传，周而复始于心为六传，归于本位，犹有生机。心复传肺则为七传。七传则一藏再伤，岂得不死，故经言，七传者死也。纪氏之说甚合经旨。先生平易解之，于理尤合经旨，更极昭明。他说纷更，俱不可从也<sup>[13]462-463</sup>。

朱子章在与栗本瑞见围绕中国经典医书《黄帝八十一难经》的讨论中，引用“七传传其所胜贼邪”和“间藏传其所生虚邪”的论断，认为纪氏的主张比较符合《难经》主旨，解释亦浅显易懂。不仅如此，朱子章还告诫栗本瑞见，围绕《难经》的解读众说纷纭，皆不可信，即需要落实到医学实践来加以把握。除了“难经五十三曰七传者死间藏者生”的论断，对于栗本瑞见提出的关于正传或问七、人迎气口、神门、耆婆万病圆、脉位等诸多问题，朱子章皆依据自身经验，站在理论的角度予以阐述，强调既要把握中国传统医书的实质，又不可过于困囿传统之见，主张结合患者病症临症施治、灵活变通。

3. 朱氏兄弟的医学实践活动体现在病理探究中。《通航一览》记载了朱子章回答幕府典药头关于“胀满”之症的疑问，写道：

恭呈太医官橘老先生大人台下……承问胀满之症云云，愚考内经之论胀满，五脏六腑靡不有之。虽各经皆有总，无不缘于脾肺肾三经。故经文提其纲曰，诸湿肿满皆属于脾。又曰，其本在肾，其末在肺，皆聚水也。东垣拘执经言藏寒生满胀之说，又拘执脉经言胃中寒则胀满之说，故立论多主于寒也。而寒极反生热之奥义，彼未明言也。丹溪乃拘执经言诸腹胀大皆属于热之说，又拘执经言诸湿肿满皆属脾土之说。故立论多主湿热相乘为病也。而热极反生寒之奥义彼亦未明言也。惟有李中梓能于经言而贯通之，乃曰胀满之症，阴阳虚实不可不辨。大抵阳症乃必热，热者多实，阴症必寒，寒者多虚，先胀于内后肿于外者为实，先肿于外而后胀于内者为虚。小便黄赤大便秘结为实，小便清白大便溏泻为虚，脉之滑数有力为实，弦浮微细为虚。色红气粗为实，

色悴声短为虚。凡诸实症,或六淫外容或饮食内伤,阳邪极达,其至必暴成于数日之间。若是虚症,或因情志多劳或因酒色过度,日积月累,其来有渐,每成于经月之后。此中梓之论为平正至当,若以寒多热少热多寒少,拘执言之,又何贵乎望闻问切也哉。愚谓诸般杂症皆有寒有热,惟临症精细用药,不必预存一寒热之见,胶滞于胸中可也<sup>[13]459-460</sup>。

针对“胀满”症状,朱子章首先引用《黄帝内经》,指出胀满的病因在于脾肾肺的湿气,同时还指出金元医家李东垣、朱丹溪论述胀满疑难之际的偏颇之所在,肯定了明代医师李中梓通过大小便、脉象、气色等表象,以阴阳虚实来分辨胀满之症的诊疗之法,认为其病理即为《黄帝内经》所阐述的清阳之气居下而不升,就会发生泄泻之病,浊阴之气居上而不降,就会发生胀满。在此,朱子章以阴阳原理来解释肺脏的功能,以身体机能的失调、阴阳两气的不调来阐述病理,也就是依循中国古典医学而进行了原理性、医道性的阐释。

如果说“以翻译《解体新书》为契机,最初开辟了以根据原典的、真正西方学术的移植和研究的道路”<sup>[17]195</sup>,预示着日本抛开中国医学、倾向于更为接近科学的兰学的话,那么,这一点是否也象征着整个日本的转向?历史上,日本在19世纪后期推行明治维新,提倡西方式的文明开化,中国医学、中国学问乃至整个中国由此而成为被日本排斥、否定、蔑视的对象。但是,再度审视中国医学在日本或是倍受推崇或是被横加批判的历史,再度回顾近代中国医学在日本的跌宕起伏的命运,我们也不可罔顾中国医学在日本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或者以一种融汇于日常的方式依旧被寄予关注、期望的历史事实。

就在日本推动文明转向的明治时代,日本医学家浅田宗伯于1895年向国会提出了延续中医的请愿。日本名医和田启十郎于1910年著成《医界之铁椎》,以西医科学解释中医,成为复兴中医第一人。日本中医古方派一代宗师汤本求真因长女患疫痢死亡,故而对现代医学产生了怀疑,从而追随和田启十郎,立志在西医一统天下

的时代复兴中医,并于1927—1928年间先后撰写了《皇汉医学》3卷出版发行。由此再来追溯近世时期朱氏兄弟在日本的医学对话,再来把握朱氏兄弟基于自身“经验”而进行论辩、推理,基于《黄帝内经》《脉经》这样的经典而进行解释、论证,也会让人禁不住感叹不已。

## 四、汀州朱氏在日的医道对话

作为一部记载日本与外国通航关系史的文献史料集,《通航一览》采取国别编年体的形式,以日本永禄九年(1566)安南(今越南)渔船漂流至德川家康的属地三河国片浜浦的事件为起点,以文政八年(1825)二月德川幕府颁布“异国船驱逐令”为终止,收录了日本与琉球、朝鲜、中国、安南、荷兰、英国、美国、俄罗斯等诸国家和地区之间的通商、渡海、漂流等内容,乃是研究近世时期的日本对外关系史的重要文献史料。该书的序言有这么一段话:

皇国居与地之正,寒暑中适,民物富庶,治隆于上,俗美于下,击壤鼓腹,遍布海内,故异邦之来,通信贸商者不鲜矣<sup>[13]1</sup>。

这一时期作为“异邦”往来的“通信贸商者”可谓不少,该书就留下了汀州朱氏兄弟在日医道对话的记载:

享保六年七月,汀州府医者朱来章来到日本,寄居于长崎通事(翻译)宅邸。世人慕名而来,请求诊治,来章皆公开接待之。其后来章回国,年月不详。享保十年二月五日,朱来章再与儒士朱佩章、朱子章、朱双玉、周致来、孙辅斋等一道来到日本,朱(来)章献书,应是接到幕府命令而再来日本。而后,朱佩章请求赐予“骑射”信牌,准予同渡唐船自由往来。十月,西国一地的诸家医师、患者抵达长崎,请求诊治。享保十一年正月,官医今大路道三、栗本瑞见奉令来访。幕府曾命栗本瑞见收集医书,今大路道三应该亦接到该令。今大路、栗本向子章询问了多个病症问题,并赠之与书<sup>[13]459下①</sup>。

这里记载了朱佩章、朱来章、朱子章屡次赴日的事迹,还提到了幕府典药头今大路道三、御

① 该段引文由笔者翻译。

用医师栗本瑞见向朱子章的“讯问”，也就是中日医师之间的对话。其中就有朱子章回复今大路道三关于“反关脉”的问题。书中记载：

承问反关脉云云。愚谓反关脉乃自母胎成形，即具此脉，非病脉也，亦非无病脉也。诸家皆云，脉由列缺络，走入臂后手阳明大肠之经也。愚在贵国，亦诊数人有此反关脉者，或有患积聚证，亦有患疝气证，其病与常脉之人皆同，何谓无病人？若无病必长生不死矣。愚数十年内在家乡，所诊反关脉之人，无一人能上六十外岁。则无病之说乃妄谈也。老先生见闻广博，优入歧黄之室，疑问二端学术，皆有根底，愚妄对之，其言当否？亦不自知也。伏祈上裁<sup>[13]460</sup>。

依此，可知朱子章以自己在日本行医的经验，列举反关脉者或患积聚症或患疝气症的事实，并以自己在家乡诊治的经验，指出其病虽与常脉之人相同，但亦有生命之虞。

此外，大庭修也提到了朱子章与其他日本医师之间的交往，他写道：

《通航一览》卷216引用了今大路亲显、栗本瑞见和朱子章之间互相解答疑问的书信，乾文斋文库旧藏也有《朱子章答宇治多云庵》《朱子章问答》二书。雪庵是纪州医师，所以可以提出疑问。《屠赤琐录》卷1还记有朱子章向间野春庵、柳如泽传授治疗疮疮知识的内容<sup>[8]137</sup>。

朱氏兄弟这一时期的交往对象，既包括日本地方首脑与下属武士，也包括不少长崎的日本人，不过最为关键的则是医学人士与文学者。上文提到的赴长崎向朱子章取经的今大路道三（1675—1737），即今大路亲显，是江户时代前期至中期的医师，为日本著名医学世家曲直濑今大路家族的后裔，七代道三。本姓橘，号商山，又名曲直濑亲显、曲直濑道三、橘玄耆、橘耆父。据杜凤娟、肖永芝、孙清伟的调查，显示：

玄耆为家中次子，因其兄玄寅（亲民）早逝，故12岁即继承家业。元禄三年（1690）升任医官典药头，曾为太医令。享保十四年

（1729），为官刻医书《普救类方》题撰序文，著有《沟断》等书。其家本姓源氏，至文禄元年（1592）赐姓橘氏，并获“今大路”家号<sup>[20]</sup>。

今大路道三著述了《沟断》二策、四策、五策，手记《商山年谱》，反对只注重伤寒论的古方派，主张广泛遵从宋代以前医术理论，是江户时期官学派的代表人物。德川吉宗在第二次借阅中医古籍《石室秘录》之前，今大路就用红笔为其中的缺漏和印刷不明的地方加以补注。

幕府御用医师栗本瑞见，则是一位与朱子章、朱来章两兄弟皆有过医学交流的医师。一代栗本瑞见直方在纪州藩主德川吉宗成为征夷大将军的时候晋升为“奥医师”，由此得以世袭“瑞见”称号，并以“奥医师”的身份服侍将军侧近。向朱氏兄弟提问的，则是栗本直方的长子栗本昌纲（1699—1775）。1728年，栗本昌纲成为见习“奥医师”，次年位列“奥医师”，随侍德川吉宗、德川家重、德川家治三代将军。《日本医疗史》记载了栗本昌纲曾主持创建制药所：

〔宽政四年〕二月，幕府在“二之丸”设立制药所，以栗本瑞见（昌纲）为主持，向田村元等人奉命管理<sup>[21]①</sup>。

依照德田武《近世日中文人交流史的研究》的记载，朱来章还与日本江户中期的黄檗宗禅僧、汉诗人大潮元皓有过交往。大潮元皓曾慕名到长崎，请朱来章为自己治病，并在自己的诗集《西溟余稿》之中留下了《寄清人朱医生》七律诗一首：“中原才子忽离群，东指扶桑日月分。万里洪涛乘汉使，千年大药属徐君。翰花晓映琼台雾，玉树秋悬仙桥云。爱尔长生传秘诀，一时还向北邦闻。”<sup>[22]</sup>

在此，审视朱氏兄弟的交往对象，或许会局限于日本社会的不同地域、各个阶层，但是，若是参照朱氏兄弟的在日活动，进而把握与日本人进行医学交流之际引经据典的事实，则可以认识到他们在日本大力弘扬的，绝不只是医术之理、

① 该段引文由笔者翻译。



中医汉方,而是带有“至理名言”的“医道”<sup>①</sup>。朱氏兄弟与日本医者之间的互动,表面上不过是针对中国医书的辩驳质疑,针对疑难杂症的探讨切磋,实际上更多的是探究阴阳气动,把握天地自然,关注人体经络,亦即由此而落实到如何探究医道至理、展开医道实践的问题。也就是说,这样的对话、实践与其说是医术、医学的对话,倒不如说本质上是一场“医道”对话。

朱氏兄弟在日的医道对话,除了前文提到的“朱子章问答”、《南京朱来章治验》,还有朱来章应幕府要求所撰写的《享保十一年八月十九日南京船所载来唐医周朱等复言》<sup>[23]</sup>。此书为周歧来与朱来章合著,他们为13种鸟兽、145种鱼贝和34种植物标明中日名称、俗称以及中国文献出处,是两位医师对动植物进行考证与鉴定的成果,现藏于国立国会图书馆。赴日期间,朱氏兄弟不仅为日本医师提供了丰富的中医药知识和诊治经验,他们与同期赴日的医师或商人所携带的中国医书,在江户时代还被以覆刻、重刻、选刊、仿写等方式在日本得以保存。据真柳诚的研究,“中国医书的和刻板为314种、679次,约半数出版于江户前期”,“日本在江户时期,从自身角度接受了中国医书,并进而接受了中医学,同时加以日本化”<sup>[24]</sup>,极大地促进了中医在日本的传播和发展。

## 五、结 语

历史上,以朱舜水、隐元隆崎、东皋心越为代表的一批儒学者或者僧侣东渡日本,为中日交流确立了文化传播的实证,亦成就了这一时期东亚区域的文明对话与互动。在这一批人物的巨大光环下,也涌现出以朱佩章、朱子章、朱来章,即汀州朱氏兄弟为代表的一群被忽略、被遗忘的草根人物。这一批人物的历史功绩却不可小觑、不容忽视,尤其是朱氏兄弟在近世日本积极输出中国医书、推动在日医学实践、参与中日医道互动,不仅成为传播中华医学和优秀文化传统的载体,更为中日文化对话提供了佐证,也最为直接

地亦具成效地成为当下东亚推动文明互鉴的重要参考。

###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 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N]. 人民日报, 2022-10-26 (1).
- [2] 潘吉星. 中外科学技术交流史论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 [3] 唐权, 刘建辉, 王子沁. 来舶清人研究ノ一ト [J]. 日本研究, 2021, 3 (62): 131-172.
- [4] 郭秀梅, 冈田研吉, 酒井静, 等. 清代医师旅日史钩沉 [J]. 中华医史杂志, 1999 (29): 115-120.
- [5] 葛文清. 全球化、现代化视角中的客家与闽西 [M] // 林仁芳, 主编. 客家研究. 北京: 燕山出版社, 2000.
- [6] 木宫泰彦. 日中文化交流史 [M]. 胡锡年,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0.
- [7] 大庭修. 江户时代中国典籍流播日本之研究 [M]. 戚印平, 王勇, 王宝平, 译. 杭州: 杭州大学出版社, 1998.
- [8] 大庭修. 江户时代日中秘话 [M]. 徐世虹, 译. 北京: 中华书局, 1997.
- [9] 松浦章. 清代海外贸易史研究 [M]. 李小林, 译.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6.
- [10] 真柳诚, 编. 跨境的传统, 飞翔的文化: 汉字文化圈之医史 [M]. 福州: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4.
- [11] 王勇. 遣唐使时代的“书籍之路” [J]. 甘肃社会科学, 2008 (1): 69-74.
- [12] 严绍璁. 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 [M].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2: 2.
- [13] 林魁, 编. 通航一覽: 第五 [M]. 东京: 国书刊行会, 1912.
- [14] 朱来章. 南京朱来章治验 [M]. 写本. 东京: 日本国立公文书馆, [出版时间不详].
- [15] 张伯伟, 编. 朝鲜时代书目丛刊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4.
- [16] 张伯伟. 从朝鲜半岛史料看中国形象之变迁

① 在此所谓的“医道”,与注重个人修养、强调济世救民的“道德素养”不同,尽管朱氏兄弟兼顾了儒学、儒医的多重身份,但是就与日本医学者的讨论而言,较之疾病症候,朱氏兄弟更为注重医理,尤其是阴阳理论,且接近于一种“纯粹医道”的立场。

- [M] //金健人. 韩国研究: 第12辑.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4: 234-258.
- [17] 杉本勲. 日本科学史 [M]. 郑彭年,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9.
- [18] キュルムス. 解体新书 [M/OL]. 前野良沢, 杉田玄白翼, 译. 东京: 須原屋市兵衛. <https://dl.ndl.go.jp/pid/2558887/1/16>.
- [19] 松浦章. 清「展海令」施行と長崎唐館設置の關係 [J]. 関西大学東西学術研究所紀要, 2008, 4 (41): 47-62.
- [20] 杜凤娟, 肖永芝, 孙清伟. 日本医书《沟断》小考 [J]. 山东中医药大学学报, 2018 (4): 339-341.
- [21] 酒井シヅ. 日本の医療史 [M]. 东京: 东京书籍, 1982: 575.
- [22] 德田武. 近世日中文人交流史の研究 [M]. 东京: 研文出版, 2004: 114-115.
- [23] 周歧来, 朱来章. 享保十一年八月十九日南京船所载来唐医周朱等复言 [M/OL]. 东京: 国立国会图书馆, 1726. <https://dl.ndl.go.jp/pid/2535827>.
- [24] 真柳诚, 著, 梁永宣, 译. 日本江戸时期传入的中国医书及其和刻 [J]. 中国科技史料, 2002 (3): 232-254.

## A Study on the Dissemination of Medical Knowledge to Japan by the Zhu Family in Qing Dynasty Tingzhou in the Context of Mutual Learning of Civilizations

SU Hua<sup>1,2</sup>

(1.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Jimei University, Xiamen 361021, China;

2. Tan Kah-kee Research Institute, Jimei University, Xiamen 361021, China)

**Abstract:** Cultural exchanges in East Asia during the so-called “modern era” in Japan have been a major focus of academic attention and are regarded as a major model for the exchange and mutual appreciation of civilizations in the East Asian seas. By exporting medical books to Japan, promoting medical practices and facilitating the interaction of medical paths, the Zhu brothers (Zhu Laizhang, Zhu Zizhang and Zhu Peizhang) of Tingzhou, an inland region of Fujian,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became a carrier for the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medicine and excellent cultural traditions, making positive contributions to Sino-Japanese cultural exchange,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the history of Sino-Japanese medical exchange and brings us inspiration for the exchange and mutual appreciation of civilizations.

**Key words:** Zhu Laizhang; Zhu Zizhang; Zhu Peizhang; medical books export; medical practice; medical ethical dialogue

(责任编辑 冯庆福)